

國
大
名
著
統
編
本

金聖
叟
批
評
本

水
滸
傳
上

〔明〕施耐庵 著
〔清〕金聖叟 批評



岳
麓
書
社

· 四大名著批评本 ·

水

浒

傳

上

金圣叹批评本

〔明〕施耐庵 著
〔清〕金圣叹 批评
罗德荣 校点



岳麓書社

· 长沙 ·

前辈学者早已传示今人，水浒故事未被编撰成书，正式刊行之前，已喧腾众口，流播民间。故事的主角宋江，历史上实有其人，梁山起义的事迹，并非全是小说家的凭空虚构。宋江领导的起义发生在北宋末年，活动在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江苏等地，见诸史书记载的，如《宋史》的《徽宗本纪》、《侯蒙传》、《张叔夜传》，王偁《东都事略·侯蒙传》、李真《十朝纲要》、徐莘《三朝北盟会编》等。尽管这些材料芜杂，汇勘起来彼此牴牾，但说明宋江的起义故事已轰动一时。再证以南宋周密在《癸辛杂识续集》中转述当时画家龚开《宋江三十六人赞》序中所云：“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可知宋江三十六人的姓名和绰号，在口头传说中已经确定，成为“说话”的一种热门话题。据南宋罗烨《醉翁谈录》所列说话篇目，就有属朴刀类的《青面兽》，杆棒类的《花和尚》与《武行者》，公案类的《石头孙立》。不过，此类“说话”名目，系各自独立的段子，属“小说”（又名银字儿）范畴。只有宋元间的话本《大宋宣和遗事》，其中前集第四节，描述了梁山起义军发展壮大到受招安的全过程，可以说已经具有《水浒》故事的轮廓，为后来长篇小说《水浒传》的创作奠定了基础。然此书系钞摭旧籍而成，夹杂文言与白话语体，参差不一。

但在元杂剧中却不提招安字眼。也许是由于尖锐的民族矛盾，包公与水浒中的梁山义士，为当时作家热烈歌颂的人物，是人民心目中两面正义的旗帜，寄托着他们的希望和理想，并借此向异族统治者控诉与抗争。据元钟嗣成《录鬼簿》、明贾仲明《录鬼簿续编》和朱权《太和正音谱》所载《水浒》剧目，总计二十五种，今人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考订，有三十余种，其中近半是写李逵的戏。但大多数已亡佚，今存高文秀《黑旋风双献功》、康进之《梁山泊李逵负荆》、李文蔚《燕青搏鱼》、李致远《都孔目风雨牢未》、无名氏《争报恩三虎下山》。这几种杂剧的情节同《大宋宣和遗事》和今本《水浒传》没有太多的渊源关系，和说话源流的水浒传说也不相同，杂剧水浒与小说水浒彼此间是一种什么关系，谁影响了谁，还有待进一步考索。

二

令人惊诧的，小说类水浒同长篇讲史类平话叙事体制融合，创作出长篇白话小说《水浒传》，竟然经历了三百多年的酝酿过程。由于文献无征，我们至今都不能确切说明《水浒传》最初的写定时间。明嘉靖二十年（1541）中进士的晁瑛编《宝文堂书目》“子杂”类列有《忠义水浒传》和《水浒传》二目，目下注云：“武定版。”这是现存明代书目中关于“武定版”的最早记载。万历十七年（1589）刊本《忠义水浒传》卷首的天都外臣序，也称嘉靖时由郭武定重刻其书。郭武定即为郭勋。袭父郭良武定侯爵故云。所谓“重刻其书”，即是说郭本之前另有其他的《水浒传》刊本存在。现存的明人笔记对此也有记述。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说：“钱塘罗贯中本者，南宋时人，编撰小说数十种，而《水浒传》叙宋江等事，奸盗脱骗机械甚详……”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也说：“今世传街谈巷语，有所谓演义者，盖尤在传奇、杂剧下。然元人武林施某所编《水浒传》特为盛行。”天都外臣（汪道昆）在《水浒传》序中亦云：“故老传闻：洪武初越人罗贯中，诙诡多智，为此书共一百回。”这些记述虽然都是根据传闻而来，但都说明嘉靖前有《水浒传》刊本；与此同时，也指出了作者是罗贯中，或是施耐庵，或是标署施耐庵、罗贯中两人共同编写。可惜嘉靖前没有留下任何本子可资足证，就连武定版原本《水浒传》也久已失传。不过当代学者倾向于施耐庵撰。

关于施耐庵的生平，可靠的文献资料非常缺乏，我们只知明初贾仲明在《录鬼簿续编》中称“至正甲辰复会”过罗贯中。至正甲辰为元末至正二十四年（1364）。既然罗贯中参与《水浒传》的成书工作，罗贯中为元末明初人，那么也间接证明施耐庵也是元末明初人。至于1952年到1966年，1981年底和1982年初的调查，在江苏兴化、大丰地区发现的所谓《施耐庵墓志》、《故处士施公墓志铭》、《施氏族谱》、《施氏长门谱》，以及《兴化县续志》之《文苑》所载《施耐庵小传》等文献资料，许多学者认为有许多抵牾不可信之处，不足为据。

三

留存今世的版本也很繁杂，有百回、一百十五回、百廿回及七十回本。从文

字的繁缛和简约，又分繁本和简本两大类。容与堂刊本《李卓吾先生批评水浒传》、天都外臣序本《忠义水浒传》、郑振铎藏《忠义水浒传》残本、袁无涯刊本《新镌李氏藏本忠义水浒全传》，以及贯华堂刊本《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属繁本系统。简本系统为双峰堂刊本《京本增补校正全像忠义水浒传志传评林》、雄飞馆合刻《英雄谱》本《水浒传》。

不仅如此，各本中又存在有无增插田虎、王庆与征辽国的区别，于是简本先于繁本，繁本由简本加工改造而来，抑或简本出于繁本，删自繁本；还有，哪个本子增插了征辽国、田虎、王庆，就成了学术界争论不休的课题。

笔者感兴趣的，是七十回本与百回本两种不同的主题思想。因为明嘉靖万历时人王圻《稗史汇编》卷一百三《文史门·天牒类·院本》条说：“今读罗《水浒传》，从空中放出许多罡煞，又从梦里收拾一场怪诞。其与王实甫《西厢记》始以蒲东遇会，终以草桥扬灵，是二梦语，殆同机局。总之，惟虚故活耳。”王圻所说的“从梦里收拾一场怪诞”，应指在一个恶梦里把梁山泊英雄都一网打尽，可这只是一场梦，“惟虚故活耳”，不是真实的结局。而百回本的梁山英雄并不是在宋徽宗的梦中被一网打尽的，因为在徽宗梦游梁山泊之前，就有人阵亡、病死、坐化；宋江、卢俊义已被御赐毒酒害死，李逵又被宋江毒死，吴用、花荣也在宋江坟旁自缢。因此王圻所说的梦和宋徽宗之梦，并非是同一个梦；换言之，在嘉靖本之前的古本《水浒传》似是七十回本。比王圻晚三十年的明代著名的戏曲理论家徐复祚在《三家村老委谈》的《宋江》条中也说：“征辽、征腊，后人增入，不尽君美（施耐庵）笔也。”至于金圣叹七十回本《贯华堂水浒传》，并非如他所自许是什么古本，据郑振铎、王利器、吴晓铃先生的校勘，金圣叹不过是依据袁无涯刻的《忠义水浒全传》百二十回本为底本，砍掉了七十一回以后部分，将原本第一回改为“楔子”，七十回虚构了卢俊义惊恶梦，让嵇康收拾梁山泊一百单八将英雄。

不过，无论原本是否为七十回本，或嘉靖前是否有七十回古本，但就以《贯华堂水浒传》存在的事实而言，既然有两种不同的结局，就必然有两个截然不同的主题思想。即七十回揭示“官逼民反”，用武力反抗官府的主题。百回或百二十回，则是以梁山起义的发生、发展到失败过程为中心线索，以宋江为小说描写的中心，通过宋江悲剧的一生，以及林冲、鲁智深、武松等被逼上梁山的过程，表现出身下层的忠义之士，想替天行道而不能替天行道的悲剧。

四

自金圣叹的贯华堂《水浒传》七十回本推出之后，正如郑振铎先生在《水浒传演化》一文中所说：“更不料他这一部腰斩的《水浒传》，却打倒了、淹没了、一切流行于明代的繁本、简本……使世间不知有《水浒传》全书者几百年。”其原因既不是“《水浒》诸种版本的陆续出现，却使金圣叹已圆了三百年的谎话再也圆不住了”，也不是今人所谓“革命文艺无悲剧”，企望永远是胜利者，而喜欢看到梁山泊大聚义，英雄排座次为止。其实是金圣叹在金本《水浒传》所作的三篇序，托名施耐庵的序、《宋史纲》、《宋史目》批语，读第五才子书法，以及每回前总评、夹批和眉批中展露出特立独行的叛逆人格，吸引了读者。

本质地说，金圣叹（1608—1661）是一个有叛逆意识的文化离轨者。他深受佛家禅宗和老庄的影响，效法魏晋阮籍、嵇康的风度，倡导“性即自然”，率性任情，不信权威，甚或“诋斥君权”，“背弃礼教”。顺治十八年（1661），苏州市民反对新任知县任吞常平仓粮和酷刑逼税仗毙一人的残暴行为，引起市民抗义，鸣钟击鼓，跪进揭帖，巡抚朱国治却百般包庇，逮捕五名秀才，次日诸生哭于文庙，这就是当时有名的“哭庙案”。此时顺治刚逝世不久，朱国治便以“震惊先帝之灵”为口实，又逮捕了金圣叹在内的十三人。传说揭帖与哭庙文为金圣叹所写，金圣叹被判斩刑。可以想见，像金圣叹这类“愤世嫉俗”，“放诞玩世”的文人，自然赞赏武松的“光明磊落”、“豪杰至性”，鲁达的“遇弱便扶，遇硬便打”的风雷性格，李逵的“不晓阿谀，不可以威劫，不可以名服，不可以利动，不可以智取”的胸襟。反之，他对宋江虽然时有“真乃人中俊杰”的赞誉，但又认为宋江奸猾、伪善，不时玩弄权术，不如李逵、鲁智深真诚。这与其说是对农民起义军领袖的攻击，倒不如说是他如同李卓吾一类知识分子，讲究真心至性，并以此来划分人的品级，带有点人文主义的色彩，未必全是政治性的计量。与此同理，金圣叹对权豪势要、贪官污吏，以及各类群小的批判，非是一般性的指点，而是痛斥、怨恨。于是金圣叹在评宋徽宗宠用高俅，而高俅又以姻亲关系为纽带，上下勾结，形成庞大的统治集团时，尖锐地指出：“夫一高俅，乃有百高廉；而一高廉，各有百殷直阁，然则少亦不下千殷直阁矣！每一人又各自养其狐群狗党二三百人，然则普天之下，其又复有宁宇乎哉！”正是这些狐群狗党，凭借政治特权，随心所欲的欺压百姓，所谓：“纵不可限之虎狼，张不可限之僚

吻，夺不可限之几肉，填不可限之谿壑，而欲民之不畔，国之不亡，胡可得也。”在金圣叹看来，是上自乱作，官逼民反，“驱却英雄入水泊”，“非生而为盗”，作者也是“怨毒而著书”的。这些观点，与其说是金圣叹站在农民革命的立场上，支持梁山起义，倒不如说梁山众豪杰的言语作为，暗含了他追求自我、众生平等的观念。他讥刺宋徽宗是个玩闹皇帝，甚或主张对权豪势要、贪官污吏把持的政府，可以使用暴力，但并不等于说金圣叹赞成否定皇权统治。反昏君与反皇权是两码事。古人云“天下者乃天下人的天下，有德者居之”，他并没有超出地主阶级民主派的观点，否则金圣叹何必幻出卢俊义一梦，一网打尽梁山英雄呢？那不是什么保护色。

五

比较的说，金圣叹的小说批评在理论上要比哲学思想深刻、系统、有创见。

明代的李卓吾以他的“童心”论突破文体尊卑的界限，把小说传奇文提高到和正统诗文相同的地位，无疑是开创了小说家的自觉意识，给小说批评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可是李卓吾对小说文本理论的建树还很肤浅，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而金圣叹恰恰补充了李卓吾的不足，开创了小说文本的新话语。因为由话本小说与讲史融合而形成的《水浒传》，显然是一种新的文体。新的小说文体需要新的小说话语。金圣叹对《水浒传》文体和艺术性的独具慧眼的批评，是同时代或后代批评家难与比肩的。

西方小说家判断小说形态时较多突出故事、人物、观点与意义。其实金圣叹早在三百多年以前，就以小说家的眼光论证过小说文本的诸要素。他在《读第五才子书》区别史传与小说创作时明确指出：“《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是因文生事。以文运事，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却要算计出一篇文字来，虽是史公高才，也毕竟是吃苦事。因文生事即不然，只是顺着笔性去，削高补低都由我。”尽管司马迁为了突出人物的个性和特点，增加可读性，使用了一些文学性的叙事手法，如细节描写，情节安排，加强人物对话等，但仍记史传真，传述价值判断为主。而小说创作则是“因文生事”，即作家遵循小说创作的规律（顺着笔性），发挥作家的想象和虚构，“削高补低”的构织小说。而在小说意象的形成过程中，作家或是反观自省，探寻人物性格与作家性格相近和相通的契合点，充分利用作家本身的生活经验；倘若描写的人物及其性格同作家不相近或根本不

熟悉时，作家应采用“设身处地法”，“亲动心而为淫妇，亲动心而为偷儿”，才能“写淫妇居然淫妇，写偷儿居然偷儿”。无独有偶，这正是俄罗斯戏剧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所谓的体验派理论，而金圣叹则早已将自我观照与设身处地的理论命之为“因缘生法”说。

经过如此创造性的想象而塑造出来的人物必然具有鲜明的性格。所以金圣叹特别推崇《水浒传》塑造了生动的人物性格，并且正是金圣叹第一次把“性格”作为一种概念，引入小说创作和批评中：“别一部书，看过一篇即休，独有《水浒传》，只是看不厌，无非为他把一百八个人性格都写出来。”强调人物性格塑造是小说创作的中心，故事情节安排服从于人物塑造，这无疑小说批评走向文本批评的重要标志。但金圣叹所欣赏的人物性格塑造，不只是写出“每一等人有一等人”身份的共同的心理性格特征，而是写出性格的个别性，所谓“《水浒传》写一百八个人性格，真是一百八样。若别一部书，任他写一千人，也只是一样，便只写两人，也只是一样”。“《水浒传》只是写人粗鲁处，便有许多写法。如鲁达粗鲁是性急，史进粗鲁是少年任气，李逵粗鲁是蛮，武松粗鲁是豪杰不受羁勒，阮小七粗鲁是悲愤无说处，焦挺粗鲁是气质不好”。这种区别是由于人物性格的内在特质所决定的，也就是金圣叹多次论说的“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的个性区别。而要表露人物的个性特质，主要是通过言语动作，特别是赋有个性化的语言，也就是金圣叹所说的声口。金圣叹对《水浒传》在这方面的艺术创作经验，给予了很高评价，也是他小说批评中分析得最细致、最为精彩的部分。

由于《水浒传》汇集了民间说书中小本水浒的艺术成就，也就必然保存了说话艺术注重故事情节，长于细节描写，讲究叙事的顺序和连贯性。金圣叹之所以不喜欢《西游记》，其原因就在于“太无脚地了，只是逐段捏捏撮撮……中间全没贯穿”，小说肌理不够严密，缺少《水浒传》情节结构上的关联、穿插、照应，以及人物和情节之间的宾主、起伏、轻重、转承等等安排。

不过，明末清初，话本小说、长篇白话小说转向书面阅读的小说，必然要逐渐摆脱说书体小说叙事模式的影响，向写和读的审美关系转换。金圣叹评改《水浒传》，为促进传统小说叙事格局的转型，无疑是提供了有理论依据的实践范本。金氏以小说家的眼光，从看小说的角度，删剪每回的开篇诗，以及文中“但见”、“有诗为证”后的韵文，使得叙事流畅，文气连贯，读者不必在体验小说世界的人物和事件时，不断被叙述者的“有诗为证”拉出局外，去欣赏并不高明的诗

句；并且如此往复的“有诗为证”，使读者不断跳进跳出，文气多处被截断，读者情绪记忆多处受挫，不能维护心理节奏的贯通和注意力的集中，必然减弱艺术效果。

值得注意的，金圣叹特别论证了《水浒传》叙述者的移位和主观眼的运用。因为传统白话小说的说话人以全知全能的观点叙述故事，可在叙事中又常常借用人物的“只见”、“但见”转换情节和空间场面。金圣叹删去小说中的韵文，力图减弱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全知全能的声口，力图转换为客观的第三人称的叙事角度，在中国古代小说形态发展史上是个突出贡献。与此同时，他在夹批中多处强调《水浒传》内视点的笔法，如“是李小二眼中事”，“武松眼中看出”，“非作者自置一笔”；如“本是杨志看十四个人也，却反看出十四人看杨志，两个‘看’字，写得睁睁可笑”。等等。人物的内视点与叙述者客观描写交融为一，人物的行动与内心活动同时展露，由视线转移带动叙事观点的转换，形成流动多视角组合的内视点，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古代小说一种独特的叙事方法，而这一方法由金圣叹作出了理论上的说明，他对中国小说叙事学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鲁德才

二〇〇五年四月

于南开大学古稀堂

*编者注：金圣叹于夹批之外，偶有眉批。本书中凡置于正文旁边之文字，均为金圣叹之眉批。

大凡读书，先要晓得作书之人是何心胸。如《史记》，须是太史公一肚皮宿怨发挥出来，所以他于《游侠》、《货殖传》特地着精神，乃至其馀诸记传中，凡遇挥金杀人之事，他便啧啧赏叹不置。一部《史记》，只是“缓急人所时有”六个字，是他一生著书旨意。《水浒传》却不然，施耐庵本无一肚皮宿怨要发挥出来，只是饱暖无事，又值心闲，不免伸纸弄笔，寻个题目，写出自家许多锦心绣口，故其是非皆不谬于圣人。后来人不知，却于《水浒》上加“忠义”字，遂并比于史公发愤著书一例，正是使不得。

《水浒传》有大段正经处，只是把宋江深恶痛绝，使人见之，真有犬彘不食之恨。从来人却是不晓得。

《水浒传》独恶宋江，亦是歼厥渠魁之意，其余便饶恕了。

或问：施耐庵寻题目写出自家锦心绣口，题目尽有，何苦定要写此一事？答曰：只是贪他三十六个人，便有三十六样出身，三十六样面孔，三十六样性格，中间便结撰得来。

题目是作书第一件事。只要题目好，便书也作得好。

或问：题目如《西游》、《三国》如何？答曰：这个都不好。《三国》人物事体说话太多了，笔下拖不动，转不转，分明如官府传话奴才，只是把小人声口替得这句出来，其实何曾自敢添减一字。《西游》又太无脚地了，只是逐段捏捏撮撮，譬如大年夜放烟火一阵一阵过，中间全没贯串，便使人读之，处处可住。

《水浒传》方法，都从《史记》出来，却有许多胜似《史记》处。若《史记》妙处，《水浒》已是件件有。

凡人读一部书，须要把眼光放得长。如《水浒传》七十回，只用一目俱下，便知其二千馀纸，只是一篇文字，中间许多事体，便是文字起承转合之法。若是拖长看去，却都不见。

《水浒传》不是轻易下笔。只看宋江出名，直在第十七回，便知他胸中已算过百十来遍。若使轻易下笔，必要第一回就写宋江，文字便一直帐，无擒放。

某尝道《水浒》胜似《史记》，人都不肯信，殊不知某却不是乱说。其实《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是因文生事。以文运事，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却要算出一篇文字来，虽是史公高才，也毕竟是吃苦事。因文生事即不然，只是顺着笔性去，削高补低都由我。

作《水浒传》者，真是识力过人。某看他一部书，要写一百单八个强盗，却为头推出一个孝子来做门面，一也；三十六员天罡，七十二座地煞，却倒是三座地煞先做强盗，显见逆天而行，二也；盗魁是宋江了，却偏不许他便出头，另又幻一晁盖盖住在上，三也；天罡地煞，都置第二，不使出现，四也；临了收到“天下太平”四字作结，五也。

三个“石碣”字，是一部《水浒传》大段落。

《水浒传》不说鬼神怪异之事，是他气力过人处。《西游记》每到弄不来时，便是南海观音救了。

《水浒传》并无“之乎者也”等字，一样人便还他一样说话，真是绝奇本事。

《水浒传》一个人出来，分明便是一篇列传。至于中间事迹，又逐段逐段自成文字，亦有两三卷成一篇者，亦有五六句成一篇者。

别一部书，看过一遍即休，独有《水浒传》，只是看不厌。无非为他把一百八个人性格，都写出来。

《水浒传》写一百八个人性格，真是一百八样。若别一部书，任他写一千个人也只是一样，便只写得两个人也只是一样。

《水浒传》章有章法，句有句法，字有字法。人家子弟稍识字，便当教令反复细看，看得《水浒传》出时，他书便如破竹。

江州城劫法场一篇，奇绝了；后面却又有大名府劫法场一篇，一发奇绝。潘金莲偷汉一篇，奇绝了；后面却又有潘巧云偷汉一篇，一发奇绝。景阳冈打虎一篇，奇绝了；后面却又有沂水县杀虎一篇，一发奇绝。真正其才如海。

劫法场、偷汉、打虎，都是极难题目，直是没有下笔处，他偏不怕，定要写出两篇。

《宣和遗事》具载三十六人姓名，可见三十六人是实有。只是七十回中许多事迹，须知都是作书人凭空造谎出来。如今却因读此七十回，反把三十六个人物都认得了，任凭提起一个，都似旧时熟识，文字有气力如此。

一百八人中，定考武松上上。时迁、宋江是一流人，定考下下。

鲁达自然是上上人物，写得心地厚实，体格阔大。论粗卤处，他也有些粗卤；论精细处，他亦甚是精细。然不知何故，看来便有不及武松处，想鲁达已是人中绝顶，若武松直是天神，有大段及不得处。

《水浒传》只是写人粗卤处，便有许多写法。如鲁达粗卤是性急，史进粗卤是少年任气，李逵粗卤是蛮，武松粗卤是豪杰不受羁勒，阮小七粗卤是悲愤无说处，焦挺粗卤是气质不好。

李逵是上上人物，写得真是一片天真烂漫到底。看他意思，便是山泊中一百七人，无一个入得他眼。《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正是他好批语。

看来，作文全要胸中先有缘故。若有缘故时，便随手所触，都成妙笔；若无缘故时，直是无动手处，便作得来，也是嚼蜡。

正如写李逵，岂不段段都是妙绝文字，却不知正为段段都在宋江事后，故便妙不可言。盖作者只是痛恨宋江奸诈，故处处紧接出一段李逵朴诚来，做个反击。其意思自在显宋江之恶，却不料反成李逵之妙也。此譬如刺枪，本要杀人，反使出一身家数。

近世不知何人，不晓此意，却节出李逵事来，另作一册，题曰“寿张文集”，可谓咬人屎撮，不是好狗。

写李逵色色绝倒，真是化工肖物之笔。他都不必具论，只如逵还有兄李达，便定然排行第二也，他却偏要一生自叫李大，直等急切中移名换姓时反称作李二，谓之乖觉。试想他肚里，是何等没分晓。

任是真正大豪杰好汉子，也还有时将银子买得他心肯。独有李逵，便银子也买他不得，须要等他自肯，真又是一样人。

林冲自然是上上人物，写得只是太狠。看他算得到，熬得住，把得牢，做得彻，都使人怕。这般人在世上，定做得事业来，然琢削元气也不少。

吴用定然是上上人物，他奸猾便与宋江一般，只是比宋江却心地端正。

宋江是纯用术数去笼络人，吴用便明明白白驱策群力，有军师之体。

吴用与宋江差处，只是吴用却肯明白说自家是智多星，宋江定要说自家志诚质朴。

宋江只道自家笼罩吴用，吴用却又实实笼罩宋江。两个人心里各各自知，外面又各各只做不知，写得真是好看煞人。

花荣自然是上上人物，写得恁地文秀。

阮小七是上上人物，写得另是一样气色。一百八人中，真要算做第一个快人。心快口快，使人对之，齜齜都销尽。

杨志、关胜是上上人物。杨志写来是旧家子弟，关胜写来全是云长变相。

秦明、索超是上中人物。

史进只算上中人物，为他后半写得不好。

呼延灼却是出力写得来的，然只是上中人物。

卢俊义、柴进只是上中人物。卢俊义传，也算极力将英雄员外写出来了，然

终不免带些呆气。譬如画骆驼，虽是庞然大物，却到底看来觉道不俊。柴进无他长，只有好客一节。

朱仝与雷横，是朱仝写得好，然两人都是上中人物。

杨雄与石秀，是石秀写得好，然石秀便是中上人物，杨雄竟是中下人物。

公孙胜便是中上人物，备员而已。

李应只是中上人物，然也是体面上定得来，写处全不见得。

阮小二、阮小五、张横、张顺，都是中上人物。燕青是中上人物，刘唐是中上人物，徐宁、董平是中上人物。

戴宗是中下人物，除却神行，一件不足取。

吾最恨人家子弟，凡遇读书，都不理会文字，只记得若干事迹，便算读过一部书了，虽《国策》、《史记》都作事迹搬过去，何况《水浒传》。

《水浒传》有许多文法，非他书所曾有，略点几则于后：

有倒插法。谓将后边要紧字，蓦地先插放前边。如五台山下铁匠间壁父子客店，又大相国寺岳庙间壁菜园，又武大娘子要同王千娘去看虎，又李逵去买枣糕，收得汤隆等是也。

有夹叙法。谓急切里两个人一齐说话，须不是一个说完了，又一个说，必要一笔夹写出来。如瓦官寺崔道成说“师兄息怒，听小僧说”，鲁智深说“你说你说”等是也。

有草蛇灰线法。如景阳冈勤叙许多“哨棒”字，紫石街连写若干“帘子”字等是也。骤看之，有如无物，及至细寻，其中便有一条线索，拽之通体俱动。

有大落墨法。如吴用说三阮，杨志北京斗武，王婆说风情，武松打虎，还道村捉宋江，二打祝家庄等是也。

有绵针泥刺法。如花荣要宋江开枷，宋江不肯；又晁盖番番要下山，宋江番番劝住，至最后一次便不劝是也。笔墨外，便有利刃直戳进来。

有背面铺粉法。如要衬宋江奸诈，不觉写作李逵真率；要衬石秀尖利，不觉写作杨雄糊涂是也。

有弄引法。谓有一段大文字，不好突然便起，且先作一段小文字在前引之。如索超前，先写周谨；十分光前，先说五事等是也。《庄子》云：“始于青萍之末，盛于土囊之口。”《礼》云：“鲁人有事于泰山，必先有事于配林。”

有獭尾法。谓一段大文字后，不好寂然便住，更作馀波演漾之。如梁中书东郭演武归去后，知县时文彬升堂；武松打虎下冈来，遇着两个猎户；血溅鸳鸯楼后，写城壕边月色等是也。

有正犯法。如武松打虎后，又写李逵杀虎，又写二解争虎；潘金莲偷汉后，又写潘巧云偷汉；江州城劫法场后，又写大名府劫法场；何涛捕盗后，又写黄安捕盗；林冲起解后，又写卢俊义起解；朱仝、雷横放晁盖后，又写朱仝、雷横放宋江等。正是要故意把题目犯了，却有本事出落得无一点一画相借，以为快乐是也。真是浑身都是方法。

有略犯法。如林冲买刀与杨志卖刀，唐牛儿与郓哥，郑屠肉铺与蒋门神快活林，瓦官寺试禅杖与蜈蚣岭试戒刀等是也。

有极不省法。如要写宋江犯罪，却先写招文袋金子，却又先写阎婆惜和张三有事，却又先写宋江讨阎婆惜，却又先写宋江舍棺材等。凡有若干文字，都非正文是也。

有极省法。如武松迎入阳谷县，恰遇武大也搬来，正好撞着；又如宋江琵琶亭吃鱼汤后，连日破腹等是也。

有欲合故纵法。如白龙庙前，李俊、二张、二童、二穆等救船已到，却写李逵重要杀入城去；还道村玄女庙中，赵能、赵得都已出去，却有树根绊跌，土兵叫喊等。令人到临了，又加倍吃吓是也。

有横云断山法。如两打祝家庄后，忽插出解珍、解宝争虎越狱事；又正打大名城时，忽插出截江鬼、油里鳅谋财倾命事等是也。只为文字太长了，便恐累坠，故从半腰间暂时闪出，以间隔之。

有鸾胶续弦法。如燕青往梁山泊报信，路遇杨雄、石秀，彼此须互不相识，且由梁山泊到大名府，彼此既同取小径，又岂有止一小径之理？看他便顺手借如人意打鹊求卦，先斗出巧来，然后用一拳打倒石秀，逗出姓名来等是也。都是刻苦算得出来。

旧时《水浒传》，子弟读了，便晓得许多闲事。此本虽是点阅得粗略，子弟读了，便晓得许多文法。不惟晓得《水浒传》中有许多文法，他便将《国策》《史记》等书，中间但有若干文法，也都看得出来。旧时子弟读《国策》《史记》等书，都只看了闲事，煞是好笑。

《水浒传》到底只是小说，子弟极要看，及至看了时，却凭空使他胸中添了若干文法。

人家子弟只是胸中有了这些文法，他便《国策》《史记》等书都肯不释手看，《水浒传》有功于子弟不少。

旧时《水浒传》，贩夫皂隶都看；此本虽不曾增减一字，却是与小人没分之书，必要真正有锦绣心肠者，方解说道好。

原夫书契之作，昔者圣人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其端肇于结绳，而其盛淆而为六经。其秉筒载笔者，则皆在圣人之位而又有其德者也。在圣人之位则有其权，有圣人之德则知其故。有其权而知其故，则得作而作，亦不得不作而作也。是故《易》者，导之使为善也；《礼》者，坊之不为恶也；《书》者，纵以尽天运之变；《诗》者，衡以会人情之通也。故《易》之为书，行也；《礼》之为书，止也；《书》之为书，可畏；《诗》之为书，可乐也。故曰《易》圆而《礼》方，《书》久而《诗》大。又曰《易》不赏而民劝，《礼》不怒而民避，《书》为庙外之几筵，《诗》为未朝之明堂也。若有《易》而可以无《书》也者，则不复为《书》也。有《易》有《书》而可以无《诗》也者，则不复为《诗》也。有《易》有《书》有《诗》而可以无《礼》也者，则不复为《礼》也。有圣人之德，则知其故；知其故，则知《易》与《书》与《诗》与《礼》各有其一故，而不可以或废也。有圣人之德而又在圣人之位，则有其权；有其权，而后作《易》，之后又欲作《书》，又欲作《诗》，又欲作《礼》，咸得奋笔而遂为之，而人不得而议其罪也。

无圣人之位则无其权，无其权而不免有作，此仲尼是也。仲尼无圣人之位，而有圣人之德；有圣人之德，则知其故；知其故而不能已于作，此《春秋》是也。顾仲尼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斯其故何哉？知我惟《春秋》者，《春秋》一书，以天自处学《易》，以事系日学《书》，罗列与国学《诗》，扬善禁恶学《礼》，皆所谓有其德而知其故，知其故而不能已于作，不能已于作而遂兼四经之长，以合为一书，则是未尝作也。夫未尝作者，仲尼之志也。罪我惟《春秋》者，古者非天子不考文，自仲尼以庶人作《春秋》，而后世巧言之徒，无不纷纷以作。纷纷以作既久，庞言无所不有，君读之而旁皇于上，民读之而惑乱于下，势必至于拉杂燔烧，祸连六经。夫仲尼非不知者，而终不已于作，是则仲尼所为引罪自悲者也。或问曰：然则仲尼真有罪乎？答曰：仲尼无罪也。仲尼心知其故，而又自以庶人不敢辄有所作，于是因史成经，不别立文，而但于首大书“春王正月”。若曰其旧，则诸侯之书也，其新则天子之书也。取诸侯之书，手治而成天子之书者，仲尼不予诸侯以作书之权也。仲尼不肯以作书之权予诸侯，其又乌肯以作书之权予庶人哉！是故作书，圣

人之事也。非圣人而作书，其人可诛，其书可烧也。作书，圣人而天子之事也。非天子而作书，其人可诛，其书可烧也。何也？非圣人而作书，其书破道；非天子而作书，其书破治。破道与治，是横议也。横议，则乌得不烧？横议之人，则乌得不诛？故秦人烧书之举，非直始皇之志，亦仲尼之志。乃仲尼不烧而始皇烧者，仲尼不但无作书之权，是亦无烧书之权者也。若始皇烧书而并烧圣经，则是虽有其权而实无其德；实无其德，则不知其故；不知其故，斯尽烧矣。故并烧圣经者，始皇之罪也；烧书，始皇之功也。

无何汉兴，又大求遗书。当时在廷诸臣，以献书进者多有，于是四方功名之士，无人不言有书，一时得书之多，反更多于未烧之日。今夫自古至今，人则知烧书之为祸至烈，又岂知求书之为祸之尤烈哉！烧书，而天下无书；天下无书，圣人之书所以存也。求书，而天下有书；天下有书，圣人之书所以亡也。烧书，是禁天下之人作书也。求书，是纵天下之人作书也。至于纵天下之人作书矣，其又何所不至之与！有明圣人之教者，其书有之；叛圣人之教者，其书亦有之。申天子之令者，其书有之；犯天子之令者，其书亦有之。夫诚以三代之治治之，则彼明圣人之教与申天子之令者，犹在所不许。何则？恶其破道与治，黔首不得安也。如之何而至于叛圣人之教，犯天子之令，而亦公然自为其书也？原其由来，实惟上有好者，下必尤甚。父子兄弟，聚族撰著，经营既久，才思溢矣。夫应诏固须美言，自娱何所不可？刻画魑魅，诋讪圣贤，笔墨既酣，胡可忍也？是故乱民必诛，而“游侠”立传；市侩辱人，而“货殖”名篇。意在穷奇极变，皇惜刳心呕血，所谓上薄苍天，下彻黄泉，不尽不快，不快不止也。如是者，当其初时，犹尚私之于下，彼此传观而已，惟畏其上之禁之者也。殆其既久，而上亦稍稍见之，稍稍见之而不免喜之，不惟不之禁也。夫叛教犯令之书，至于上不复禁而反喜之，而天下之人岂其复有忌憚乎哉！其作者，惊相告也；其读者，惊相告也。惊告之后，转相祖述，而无有一人不作，无有一人不读也。于是而圣人之遗经，一二篇而已；诸家之书，坏牛折轴不能载，连阁复室不能度也。天子之教诏，土苴之而已；诸家之书，非缥緲不为其题，非金玉不为其签也。积渐至于今日，祸且不可复言。民不知偷，读诸家之书则无不偷也；民不知淫，读诸家之书则无不淫也；民不知诈，读诸家之书则无不诈也；民不知乱，读诸家之书则无不乱也。夫吾向所谓非圣人而作书，其书破道，非天子而作书，其书破治者，不过忧其附会经义，示民以杂；测量治术，示民以明。示民以杂，民则难信；示民以明，民则难治。故遂断之破道与治，是为横议，其人可诛，其书可烧耳，非真有

所大诡于圣经，极害于王治也，而然且如此，若夫今日之书，则岂复苍帝造字之时之所得料，亦岂复始皇燔烧之时之所得料哉？是真一诛不足以蔽其辜，一烧不足以灭其迹者。而祸首罪魁，则汉人诏求遗书，实开之衅。故曰烧书之祸烈，求书之祸尤烈也。烧书之祸，祸在并烧圣经。圣经烧，而民不兴于善，是始皇之罪万世不得而原之也。求书之祸，祸在并行私书。私书行而民之于恶乃至无所不有，此汉人之罪亦万世不得而原之也。然烧圣经，而圣经终大显于后世，是则始皇之罪犹可逭也。若行私书，而私书遂至灾害蔓延不可复救，则是汉人之罪终不活也。

呜呼！君子之至于斯也，听之则不可，禁之则不能，其又将以何法治之与我？曰：吾闻之，圣人之作书也以德，古人之作书也以才。知圣人之作书以德，则知六经皆圣人之糟粕，读者贵乎神而明之，而不得栉比字句，以为从事于经学也。知古人之作书以才，则知诸家皆鼓舞其菁华，览者急须褰裳去之，而不得拮据拾齿牙以为谭言之微中也。于圣人之书而能神而明之者，吾知其而今而后始不敢于《易》之下作《易》传，《书》之下作《书》传，《诗》之下作《诗》传，《礼》之下作《礼》传，《春秋》之下作《春秋》传也。何也？诚愧其德之不合，而惧章句之未安，皆当大拂于圣人之心也。于诸家之书而诚能褰裳去之者，吾知其而今而后始不肯于《庄》之后作广《庄》，《骚》之后作续《骚》，《史》之后作后《史》，《诗》之后作拟《诗》，稗官之后作新稗官也。何也？诚耻其才之不逮，而徒唾沫之相袭，是真不免于古人之奴也。夫扬汤而不得冷，则不如且莫进薪；避影而影愈多，则不如教之勿趋也。恶人作书，而示之以圣人之德，与夫古人之才者，盖为游于圣门者难为言，观于才子之林者难为文，是亦止薪勿趋之道也。

然圣人之德，实非夫人之能事；非夫人之能事，则非予小子今日之所敢及也。彼古人之才，或犹夫人之能事；犹夫人之能事，则庶几乎小子不揣之所得及也。夫古人之才也者，世不相延，人不相及。庄周有庄周之才，屈平有屈平之才，马迁有马迁之才，杜甫有杜甫之才，降而至于施耐庵有施耐庵之才，董解元有董解元之才。才之为言材也。凌云蔽日之姿，其初本于破核分荚，于破核分荚之时，具有凌云蔽日之势，于凌云蔽日之时，不出破核分荚之势，此所谓材之说也。又才之为言裁也。有全锦在手，无全锦在目；无全衣在目，有全衣在心；见其领，知其袖；见其襟，知其帔也。夫领则非袖，而襟则非帔，然左右相就，前后相合，离然各异，而宛然共成者，此所谓裁之说也。今天下之人，徒知有才者